

论三国时期的重学意识

胥绍志 周维仁

内容提要 三国时期,群雄割据,战乱频仍。各方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,都在不遗余力地招揽人才。加之门阀观念被突破,人物品评之风兴起,造成继战国时期之后的一次“重学意识”高扬,人才荟萃的局面,从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。

关键词 三国时期 重学意识 唯才是举

毛泽东曾说:“吾人览史,恒赞叹……三国竞争之时,事态百变,人才辈出,令人喜读。”^[1]三国时期人才众多,从上到下,大都好学,重视知识,重视人才,重视教育。刘备“年十五,母使行学,与同郡刘德然、辽西公孙瓒俱事故九江太守卢植”。曹操二十岁举孝廉为郎,本想“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,欲秋夏读书,冬春射猎,以待天下清平,方出为仕”,只因乱世,身不由己,被卷入政治斗争纷乱的洪流中。《魏书》本纪说“魏武御军三十余年,手不释书。昼则讲武策,夜则思经传,登高必赋,及造新诗,被之管弦,皆成乐章”。他的黄须儿越骑将军曹彰,史称少善射御,臂力过人,手格猛兽,不避险阻,数从征战,意气慷慨。曹操却抑之:“汝不念书慕圣道,而好学乘汗马击剑,此一夫之用。”陈思王曹植“十余岁,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,善属文”。《魏书》说魏文帝曹丕“年十八能属文,有逸才,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”。

孙权“年十五,吴郡太守朱治举孝廉,扬州刺史严宋举权为茂才”。他劝吕蒙和蒋钦读书与闾泽封侯这两件事,就是“重学意识”的典型例证。初权对吕蒙及蒋钦曰:“卿今当涂掌事,宜学问以自开益。”蒙曰:“在军中常苦多务,恐不容复读书。”权曰:“卿言多务,孰若孤?至统事以来,省三史诸家兵书,自以为大有所益。如卿二人,意性朗悟,学必有得之,宁当不为乎?光武当兵马之务,手不释卷,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。卿何独不自勉助耶?”吕蒙于是发奋读书,笃志不倦。几年以后,学识大进。鲁肃谋取荆洲,吕蒙密陈三策。一向小看吕蒙的鲁肃大为惊叹,拊蒙背曰:“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,至于今日,学识英博,非复吴下阿蒙。”孙权也叹道:“人长而进,盖吕蒙、蒋钦不可及也。富贵荣显,更能折节好学,耽悦书传,轻财尚义,所行可迹,并作国士,不亦休乎!”^[2]闾泽“家世农夫,至泽好学,居贫无资,常为人佣书,以供纸笔;所写既毕,诵读亦遍,追思论讲,究览群籍,兼通历数,由是显名。举孝廉,除钱塘长。赤乌二年,拜太子太傅。泽以经传多文,难得尽用,乃斟酌诸家,刊约礼文及诸注说,以授二官。又著乾象历注,以正时日。以儒学勤劳,封都乡侯”^[3]。在封建社会中,特别是在战火纷飞的三国动乱时期,不是以显赫的军功或突出的政绩,而是以“儒学勤劳”封侯,实属罕见。

士大夫中,好学之士,在三国时期比比皆是。诸葛亮在隆中,虽然过着粗素清苦的“布衣”生

活,却发愤博览群书,广交士林,密切关注国家形势。巴西太守、后迁丞相长史的向朗因马稷失街亭事件,坐免官还成都,“自去长史,优游无事三十年,乃更潜心典籍,孜孜不倦,年逾八十,犹手自校刊定谬误,积聚篇卷,于时最多”。张昭以老病,退职离休,在里宅无事,乃著《春秋左氏传》及《论语注》,翰墨不辍,终年八十一岁。钟会年少,受母教诲,“年四岁授《孝经》,七岁诵《论语》……十五岁使入太学,问四方奇文异训”。成年之后,更是日夜勤学,以才能技艺闻于世。《三国志·钟会传》说他“及壮有才数技艺而博学”。《书断》说他“善书。隶书逸致飘然,有凌云之志”。王隐《晋书》载司马宣王女婿、征南将军杜预“智谋渊博,明于礼乱,著有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,成一家之言”。《三国志·杜畿传》注引:武帝司马炎谓杜预曰:“卿有何癖?”曰:“臣有《左传》癖。”

普通黎庶阶层,好学勤奋之人亦比比皆是。例如:《魏书·邴原传》注引《原别传》说,原十一而丧父,家贫早孤,邻有书舍,原过其傍而泣。师问曰:“童子何悲?”对曰:“孤者易伤,贫者易戚,夫书者,必皆俱有父兄者,一则羨其不孤,二则羨其得学,心中恻然而为涕零也。”师亦哀原之言而为之泣曰:“欲书可耳。”曰:“无钱资。”师曰:“童子苟有志,我徒相教,不求资也。”於是遂就读书,一冬之间,诵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自在童龀之中,岿然有异。既长,“单步负笈,苦身力行”远游求学,后与经学大师郑玄齐名,海内清谈,谓青州有邴、郑之学。又如步骛避难江东,单身贫困,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,俱以种瓜自给,尽勤四体,夜诵经传。吴帝孙权赤乌九年,代陆逊为丞相,犹海育门生,手不释书,被服居处,有如儒生。再如魏文帝常侍王象,年少时家贫为人奴仆,后为入放羊,偷读诗书,被主人鞭笞。《三国志·杨俊传》注引《魏略》云:“新出之中,惟象才最高,受诏撰《皇览》,数年成,合四十余部,八百余万字。……京师称美,称为儒宗。”蜀汉史学家谯周幼孤,长大后好古笃学,家里虽贫穷,却不热衷产业,一心致学。“诵读典籍,欣然独笑,以忘寝室”。作《古史考》二十五篇,皆凭旧典以纠其谬。《晋书·陈寿传》说,陈寿“少好学,师事同郡谯周”。在谯周指导下,陈寿阅读了大量古代史著,尔后他能撰成传世的良史《三国志》,是与谯周早年的培养分不开的。

三国时期,战火纷飞,猛将如云,而好学敬儒的将帅亦比比皆是。史称“(张)郃虽武将,而爱乐儒士,尝荐同乡卑湛,经明行修”。明帝曹睿乃“擢湛为博士”。破虏将军李典“好学问,贵儒雅,不与诸将争功,敬贤士大夫,恂恂若不及,军中称其长者”。黄盖年少时,虽处贫贱,常以负薪余间,学书疏,讲兵事。甘宁“颇读诸子”。太史慈则“少好学”。吕蒙说关羽“人长而好学,读《左传》略皆上口”,所以有关羽千里走单骑,秉烛读《春秋》的传说。张飞也并非一味莽撞的武夫。《三国志·刘巴传》注引《零陵先贤传》说:“张飞尝就巴宿,巴不语”,说明张飞有意去亲近当时“诸文诤策皆出其手”的尚书刘巴。所以,魏谋臣程昱等感称:“羽、飞万人之敌也。羽善待卒伍,而骄于士大夫;飞爱敬君子,而不恤小人。”^[4]

建安时代是中国由统一入割据的过渡时期,这时候的人才风起云涌,有如春秋战国气象,单就文学一项而论,就被历代学者誉为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。文学艺术在汉灵帝的有力支持下(鸿都门学),在蔡邕等人的影响下,出现了文质相称的新气象。此时名家荟萃,佳作迭出。曹操、曹丕和曹植,都是建安时代的大诗人。复有“建安七子”,如曹丕《典论》所说:“斯七子者,于学无所遗,于辞无所假,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,仰齐足而并驰。”他们的作品,为后人所传诵。著名女诗人蔡文姬也是建安文学中的一颗璀璨明珠。她是蔡邕的女儿,自幼勤读,能背诵数百诗篇。初夫亡无子,后为胡骑所获,归南匈奴左贤王,生二子。曹操念蔡邕无嗣,把她赎回中国,嫁给陈留董祀。这就是了后人乐道的“文姬归汉”的故事。《三国志·王粲传》注引《列女传》云:“曹操问文姬曰:‘闻夫人家多坟籍,犹能记忆之不?’文姬曰:‘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,流离涂炭,罔有存者,今所诵忆裁四

百余篇耳。’”她的《悲愤诗》、《胡笳十八拍》均是这一时期文学上的代表作。魏文帝甄皇后“九岁喜书,视字辄识,数用诸兄笔砚。兄谓后言:‘汝当习女工,用书为学,当作女博士耶?’后答言:‘闻古者贤女未有不学前世成败以为己诫,不知书何由见之。’”^[5]她的《塘上行》,也不失为五言诗的上乘之作。

封建时代的儒学所推崇的德行,是为封建经济和封建政治服务的。汉代儒者,将先秦儒者提出的忠孝仁爱等,阐发为“三纲五常”的教条。儒家是肯定君权的,孔子提出“正名”说,就是要求君臣父子夫妇等各守本位,维持群体安定。儒学就是维护封建秩序的理论基础。《北史·儒林传》上说:“儒者,其为数也大矣,某利物也博矣,以笃父子,以正君臣,开正化之本原,凿生灵之耳目,百王损益,一以贯之,虽世或污隆,而斯文不坠。”这非常深刻地阐明了汉代以来儒学的作用。儒家学说,推崇经世致用,儒者由士而仕,在封建权力结构中发挥政治功能,以匡辅君主“治国平天下”。所以东汉以后,魏、蜀、吴三国缔造者,无不提倡儒家经学,聚揽人才。然而汉末以来,封建统治者失去了昔日的权力,原有社会运转机制完全瘫痪,旧日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,已暂时让位于各阶级、各政治集团激烈斗争的需要。所有社会成员,似乎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解脱。社会旧有秩序被打破,新的秩序尚未建立,即使在魏、蜀、吴三国鼎立形成之后,新的秩序仍在建立之中。因之各社会成员,自觉或不自觉地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,置身于各政治集团之中。周瑜曾引用东汉初年马援对刘秀说过的一段话:“当今之世,非但君择臣,臣亦择君。”士者安身立命,往往在此一举,正所谓“凤翱翔于千仞兮,非梧不栖;士伏处于一方兮,非主不依”。

在长期分裂割据,战乱频仍,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,每一个人,每一家族,每一社会集团,每一割据政权,都要求得生存、自立和发展,因而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。重视人才,则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,发挥人才群体的优势,从而有利于个人聪明才智的充分显示。加之,东汉一统帝国的瓦解,人民热衷于寻找重新统一和治国的理论,这些时代条件,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所谓“事态百变,人才辈出”的特殊时期。

汉初,武帝采纳董仲舒、公孙弘的建议,在京师立太学,又令郡县推荐孝廉、茂才供朝廷选用,将儒生的德行与仕途结合起来。汉末和三国时期,庶人阶层和中小地主阶级的人要想做官,只有先读书,学好儒家经学,能写文章奏表,通过课考;或被察举、征辟,才能走上仕途。因而两汉以来,特别是东汉和三国时期,无论中央太学,地方庠序和私家讲学,都十分发达。太学生数以千数,游学之士,数以万计。一家私馆有的学生动辄数百上千。蔡玄教授经学,门徒常有千人,历来著录共有一万六千人。郑玄避黄巾之乱,“客耕东莱,学徒相随,已数千人”^[6]。

社会阶级的分化浮沉和动荡,必须导致人才的大量涌现。各政治军事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,亦放弃传统的用人的清规戒律,不拘一格,广揽人才,为广大士人阶层敞开了大门。而在两汉时期实行的“察举制”、“征辟制”名义上重视道德、文章,实际上所选拔者多为徒有虚名的华门士族,或欺世盗名的假名士,其流弊至东汉末年愈演愈烈。曹操“唯才是举”的方针,正是针对这种弊端而提出来的。曹操所举的贤才中,一半是出身下层,身处卑位的人物。可见“唯才是举”的主要目的是打破社会地位的藩篱,能从社会下层选拔人才。而且有才必用,用必尽才。求之若渴,屈己待人,“青青子衿,悠悠我心”,“周公吐哺,天下归心”。建安十五年《求贤令》曰:“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,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?及其得贤也,曾不出闾巷,岂幸相遇哉?上之人不求之耳。今天下尚未定,此特求贤之急时也。……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,唯才是举,吾得用之。”在建安十九年,又颁布了《敷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》。建安二十二年,又发布了《举贤勿拘品行令》,一而

再、再而三的强调“唯才是举”。史称魏武拔俘虏为大将，赦死囚为从事。不恶小耻，不计小节，敬来贤为上宾，礼降将而封侯。所以他雄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谋士如林。陈寿盛赞曹操“官方授才，各因其器，矫情任算，不念旧恶，终能总御皇机，竟成洪业者，惟其明略最优也。”^[7]魏文帝也曾言：“官必用才。以亲，非兴邦之选。”^[8]提倡用贤，反对用亲。

孙权少年博学，性格开朗，“择人而任势”。孙策死去，孙权便向周瑜求教，如何策守父兄之业。周瑜说：“自古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。为今之计，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，然后江东可定也。”孙权招揽人才，知人善任，以至“威震江东，深得人心”。周瑜向孙权推荐鲁肃，鲁肃向孙权推荐诸葛瑾；张紘又向孙权推荐了顾雍。以后“连年以来，你我相荐”，文得阚泽、严峻、薛琮、程秉、朱桓、张温、骆统、吾粲等；武得吕蒙、陆逊、徐盛、潘璋、丁奉等。一时人才荟萃，文武咸集，共相辅佐，由此江东岿然不动。陈寿称赞孙权“屈身忍辱，任才尚计，故能自擅江表，成鼎峙之业”^[9]。

刘备转战半生，仍托栖于人，直至襄阳隐哲司马徽的明说暗点：“所以至今落魄不偶，盖因将军左右不得人耳。”《襄阳记》说，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，德操曰：“儒生俗士，岂识时务，识时务者，在乎俊杰，此间自有伏龙、凤雏。”备问为谁，曰：“诸葛孔明、庞士元也。”终于使刘备豁然开朗，演出了闻名千古、屈己求贤的绝唱“三顾茅庐”。刘备请出诸葛亮出山相助，如鱼得水，意气风发，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。陈寿说刘备“弘毅宽厚，知人待士，盖有高祖之风，英雄之器焉。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，而心神无二，诚君臣之至公，古今之盛轨也”。

总之，一个时期的人才辈出，群星汇聚，都和时代、社会的巨大转折密切地联系着。一是思想获得解放，学术文化相应得到发展，推动社会向前；二是每个割据政权在竞争中都要求生存，要求自立和发展。而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。史学家司马光曾说：“为治之道，莫大于用人。”为了争取人才为己用，他们不得不放弃传统的用人的清规戒律，不拘一格，广揽人才。这样门第观念、论资排辈思想受到削弱——士族寒门势力的消长，门阀制度的瓦解，仕途为广大士人阶层敞开了大门。加之传统观念突破，学术文化的长足进步，人物品评之风上扬，这些就是三国时期“重学意识”得以发展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因素，也是汉末三国时期“重学意识”的历史背景。

重学的年代，必然会形成这时代人才荟萃的局面，从而豪杰之士，大显身手，各显其能，或文韬武略，或智通双全，或勇冠三军，或文才横溢，或学贯古今。总之，三国时期的“重学意识”，一方面促进了教育的发展；另一方面，大批人才的涌现，对三国时期的社会和中国文化、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。

注释：

[1]读《伦理学原理》批语。

[2]《三国志·吕蒙传》注引《江表传》。

[3]《三国志·阚泽传》。

[4]《三国志·张飞传》。

[5]《三国志·甄后纪》注引《魏略》。

[6]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。

[7]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。

[8]《北史·外戚传》。

[9]《三国志·孙权传》。